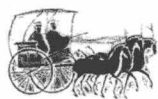


B222. 15
12



齐鲁文化经典文库

大学 中庸说解

么峻洲 著

孝经注译

宫晓卫 注译

山东出版集团

齐鲁书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大学 中庸说解 孝经注译 / 么峻洲著, 宫晓卫注译. — 济南: 齐鲁书社, 2009. 4

(齐鲁文化经典文库)

ISBN 978-7-5333-2164-2

I. 大… II. ①么…②宫… III. ①大学—研究②中庸—研究③孝经—注释④孝经—译文 IV. B222.15
B823.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9)第 017114 号

齐鲁文化经典文库

大学 中庸说解 么峻洲 著

孝经注译 宫晓卫 注译

主管单位 山东出版集团

出版发行 齐鲁书社

社 址 济南经九路胜利大街 39 号

邮 编 250001

网 址 www.qlss.com.cn

电子邮箱 qlss@sdpress.com.cn

印 刷 山东新华印刷厂

开 本 720 × 1020 / 16

印 张 19.75

插 页 3

字 数 275 千

版 次 2009 年 4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9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标准书号 ISBN 978—7—5333—2164—2

定 价 38.00 元

《齐鲁文化经典文库》

出版说明

齐鲁大地是中华民族主流文化的主要发祥地,数千年来,生长在这里的齐鲁人,用自己的聪明和智慧创造了璀璨的文明。首先是在中华文化的整体框架中地位突出、做出重大贡献的先秦诸子,其中影响尤著者大部分生长于斯;其后历朝历代,几乎都有引领潮流、成就卓著的思想家、文学家、科学家等,他们为中华文化的形成和发展谱写了辉煌的篇章,同时也留下了一大批千古流传、影响深远的文化典籍。将这些记录着他们的思想、积淀着丰富厚重的文化内涵、为一代代中国人所承继的典籍系统地予以整理出版,从而进一步扩大齐鲁文化的影响,提高其在当代人中的认知度,促进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积累、传承和弘扬,无疑具有重要的意义。鉴于此,我们向读者推出了这套“齐鲁文化经典文库”。该书的出版系由山东出版集团组织,具体工作由齐鲁书社负责实施。

通过有关专家论证,确定本“文库”的收录范围是那些由齐鲁籍人士(或有一说为齐鲁籍人士)著述的、已经独立成册、在中华历史文化典籍中堪称经典的著作;对像荀子这样原籍虽非齐鲁,但其主要政治生活是在齐鲁地域、其形成影响的主要思想和主要著述也产生在这里的个别作家,其经典著作也酌情收录。

收录的作品均采用现代标点本,除小说、戏曲之外,其余作品尽可能加以注释,而对先秦典籍则多数予以今译,以便于读者

的阅读和理解。所收部分校注本因问世较早,其中难免存有时代的痕迹,诸如高亨先生的《周易大传今注》,陆侃如、牟世金先生的《文心雕龙译注》等,但这些著作是世人公认的具有权威性的注本,仍需得到我们的尊重。

对经典著述的整理出版绝非一日之功,因此,本“文库”在最初集中推出一批后,未出品种将陆续整理出版,谨此说明。

齐鲁书社

2009年3月

前言

《大学》与《中庸》均出自《礼记》一书，所以我们在学习之前，有必要对《礼记》有所了解。

《礼记》在儒家经典中比较晚出。它的出现，众说纷纭，始终没有定论，主要有下面几种说法：

一种说法是：秦始皇焚书坑儒，儒家受到几近毁灭性的打击，其经典几乎荡然无存。这里需要说明的是，所谓儒家经典《诗》、《书》、《礼》等，实际是中华民族自上古传下来的经典，不是儒家一家的，但孔子第一个认识到它们是中华文化的根源和血脉，所以对它们进行了开创性的研究，并以它们为教材传授给弟子。这样，中华文化才有了中心，形成传统，得以代代传下来。但是，孔子的努力，在当时并没有受到世人的重视，直到西汉建立之后，这些经典才开始重新被搜集、整理、恢复起来。据《史记·儒林列传》和《汉书·艺文志》的记载，汉初有个叫高堂生的人，传授《礼经》；到汉孝帝、汉宣帝时，有个叫后仓的儒者，对高堂生的学问学得最好，也开始收徒讲学。后仓有两个学生最有名：一个叫戴德，一个叫戴胜，两人的关系是堂叔侄，人们称叔叔为大戴，侄子为小戴。戴德传《礼记》85篇，称为《大戴礼记》；戴胜传《礼记》49篇，称为《小戴礼记》，而《小戴礼记》就是我们今天所说的《礼记》。

另一种说法是：“武帝末，鲁恭王坏孔子宅，欲以广其宫，而得古文《尚书》及《礼记》、《论语》、《孝经》凡数十篇，皆古文也。”（《汉书·艺文志》）据此说，《礼记》是鲁恭王坏孔子宅所得，不是戴胜所传。这一说法得到了东汉大儒王充、许慎的认同。

还有一种说法是出自《汉书·河间献王传》。该传说：“（汉景帝的儿子河间献王）修学好古，实事求是，从民得善书，必为好写与之，留其真，加

金帛赐以招之。由是四方道术之人不远千里,或有先祖旧书,多奉以奏献王者,故得书多。……献王所得书皆古文先秦旧书,《周官》、《尚书》、《礼》、《礼记》、《孟子》、《老子》之属,皆经传说记,七十子之徒所论。”这就是说,《礼记》是河间献王花大价钱从民间收集来的。

上述三种说法,比较而言,似乎以第一种说法更为实际一些。

《礼记》有两个鲜明的特点:一是包容量极大——它几乎涉及了上古三代至秦汉文化的一切领域,可以称得上是一部古代文化的百科全书;二是思想极为深刻——它对很多重大的哲学问题,尤其是关于人与文化的问题,有着极为深刻精湛的论述,因而它可以说是古代一部优秀的哲学著作。由此可见,《礼记》的内容博大精深。

《礼记》中所说的“礼”,不仅包括今天我们所说的各种礼节,也包括了人类社会的一切文化现象和各种规则,以及作为各种文化现象和规则根基的最基本的原则。而《大学》和《中庸》,则是全书 49 篇中思想最为深刻的两篇,所以到了南宋,它们被朱熹选入“四书”而独立成书了。

《大学》、《中庸》都很难读。朱熹和弟子们对二书进行了深入细致地讨论,讨论的成果后来都收入《朱子语类》和《或问》等书中。为了更好地理解这两部书,我摘引了其中的部分内容,附在有关章节的后面,以方便大家阅读、借鉴。但由于不是完整地摘引,有的内容在顺序上也略有调整,所以个别地方与原著会有一定出入,今特此说明,敬希见谅。

在写《大学说解》和《中庸说解》的过程中,我参考了许多先哲和时贤的著作,主要有:

朱熹:《大学章句》、《中庸章句》,北京中国书店;

朱熹:《朱子语类》(一)、(二),岳麓书社;

王懋竑:《朱熹年谱》,中华书局;

龙汉宸:《礼记》,北京燕山出版社;

牟宗三:《中国哲学特质》,上海古籍出版社;

牟宗三:《中国哲学十九讲》,上海古籍出版社;

牟宗三:《心体与性体》,上海古籍出版社;

岑溢成:《大学义理疏解》,台北鹅湖出版社;

南怀瑾:《原本大学微言》,世界知识出版社;

杨汉祖:《中庸义理疏解》,台北鹅湖出版社;

吴树平:《白话四书五经》,国际文化出版社。

这里,谨向列位先哲和时贤表示诚挚的谢意。我的译注和说解一定会有错误和不当之处,还请专家和读者指正。

在长期的写作过程中,我始终得到好友罗义俊先生和齐鲁书社的支持与鼓励;好友金大为教授对拙作进行了审阅和校对,使我能放心地把原稿寄出去。在这里,我要向罗义俊先生、金大为教授和齐鲁书社的李兴斌主任、李军宏编辑表示衷心的感谢!

最后,我还要向所有关心我的朋友致敬!向读者致敬!向持不同意见的专家和学者致敬!

作者

2006年5月

目录

前言	1
----------	---

大学说解

引子	1
朱子序	11
一、经一章	20
二、传首章	37
三、传第二章	41
四、传第三章	44
五、传第四章	49
六、传第五章	51
七、传第六章	57
八、传第七章	63
九、传第八章	66
十、传第九章	70
十一、传第十章	76

中庸说解

引子	90
朱子序	100
一、天命之谓性	111
二、君子中庸	124
三、中庸其至矣乎	126
四、道之不行也	127

五、道其不行矣夫	129
六、舜其大知也与	131
七、人皆曰予知	134
八、回之为人也	136
九、天下国家可均也	138
十、子路问强	140
十一、素隐行怪	143
十二、君子之道费而隐	146
十三、道不远人	151
十四、君子素其位而行	155
十五、君子之道辟如行远必自迩	160
十六、鬼神之为德	162
十七、舜其大孝也与	164
十八、无忧者其惟文王乎	168
十九、武王周公其达孝矣乎	170
二十、哀公问政	174
二十一、自诚明谓之性	195
二十二、至诚尽性	196
二十三、其次致曲	200
二十四、至诚之道可以前知	202
二十五、诚者自成也	205
二十六、至诚无息	208
二十七、大哉圣人之道	214
二十八、愚而好自用	219
二十九、王天下有三重焉	223
三十、仲尼祖述尧舜	226
三十一、唯天下至圣	229
三十二、唯天下至诚	233
三十三、衣锦尚絅	236

大学说解

引子

《大学》原是《礼记》的第四十二篇。那么，它的作者是谁？又是谁把它从《礼记》中抽了出来的？抽出来之后对原本有否改动？等等，所有这些问题，现在一并简单介绍如下。

一、《大学》是怎样独立成书的

关于这个问题，有多种说法：一种说法是《大学》在汉、唐时已经单行；一种说法是韩愈在《原道》中曾引用《大学》中的文句，所以认为《大学》在韩愈时已单行；一种说法是宋仁宗曾以《大学》赐及第进士，所以《大学》的单行应在宋仁宗时；还有一种说法是宋朝司马光曾著《大学广义》，这是对《大学》专篇的注解，所以有人推定《大学》单行是从司马光开始。但据考察，《礼记》中有十几篇在宋代或以前就有注解，不能据此认为这些篇当时就独立成书了。

合理的推测是，《大学》能独立成书，首先要被人认为有独立成书的价值，特别是要得到专家的认可。在南宋，《大学》首先得到了当时两位儒学大师程颢、程颐的大力表彰。他们认定《大学》是“孔氏之遗书”，推许为“初学入德之门”。因此，《大学》受到当世儒者的普遍重视，替它后来的单行，奠定了稳固的基础。

作为程氏弟子的朱熹，研究儒家的经典用心至为细密。他为《大学》、《中庸》、《论语》、《孟子》分章析句，为《大学》、《中庸》作注，为《论语》、《孟子》编著“集注”。宋孝宗淳熙十六年（1189年），他60岁时，任秘书阁修撰，在这一年二月，他为《大学章句》、《中庸章句》写了序言。他

说：“二书定著已久，犹时加窜改不辍，至是，以稳洽于心而始序之。”第二年，即宋光宗绍熙元年（1190年），朱熹到漳州任官，用公费刊刻《大学》、《论语》、《孟子》、《中庸》，称为“四子书”。他在《书临漳所刊四子书后》中说：“河南程夫子之教人，必先使之用力乎《大学》、《论语》、《中庸》、《孟子》之书，然后及乎六经；盖其难易远近，大小之序，固如此而不可乱也。故今刻四古经，而遂及乎此四书者，以先后之。”（《朱子大全文集》卷八十二）由此可知，《大学》完全脱离《礼记》而成为一独立文献，应当从这时开始。“四子书”出现之后，《大学》、《中庸》的原书出处，反渐渐为人所忽略。

二、《大学》的作者是谁

《礼记》一书，是合并许多人的著作编成的，就今日流通的本子来看，没有任何一篇是标明作者的，《大学》一篇也不例外。

有人主张《大学》是子思（孔子的孙子孔伋）所作，但并未举出确凿可信的证据。较多人信服的说法则与朱子的《大学章句》（即朱熹的《大学》改本）相关联。朱子撰述《大学章句》，把原本的结构改为经一章传十章。所谓“经”，就是圣人孔子之言，是人应该遵从的大经常法；所谓“传”，是指注释或阐述经意的文字。朱熹认为“《大学》之经一章，盖孔子之言，而曾子述之；其传十章，则曾子之意，而门人记之。”朱子这段话，完全是从《大学》本文出发，根据他的师传和毕生研究孔子学说的经验作出自己的论断：首先，他认为《大学》的基本思想出自孔子，“经”中的话都是孔子说的。因为经文文辞简明浅近而义理深远周严，只有孔子这样的圣人才说得出来。其次，孔子的弟子曾参传述孔子这方面的思想，并加以发挥，于是形成《大学》传文的内容。再次，曾子的弟子把曾子的传述书为文字就编成了我们见到的《大学》。朱熹的第二、三推断，是因为“传文或引曾子之言，而又多与《中庸》、《孟子》者合，则知成于曾子门人之手，而子思以授孟子无疑也”（朱熹著《大学或问》）。

仔细一想，朱熹的论断也很主观。因为《大学》“多引用曾子之言，而

门人记之”就认为《大学》是曾子所作,其理由是不充分的。我们不能因为一篇没有作者的文章里,引用谁的话多,就认为是该人所作。其次,朱熹认为传文的思想内容与孟子(据说是曾子学生子思的再传弟子)、《中庸》的思想相合,所以顺势断定《大学》出自曾子之手,理由并不充分。这里含有朱熹的主观成分。《孟子》一书中,很少看到《大学》的影响,但曾子的“吾日三省吾身”和曾子对孔子之道的理解,却深深地影响着孟子。

朱熹的理由虽然不充分,但仍然坚持自己的说法:认为《大学》的经文是孔子讲的;传文是曾子向弟子们讲解经文由弟子们记下来的。人们相信朱子的说法的主要原因是认为在孔孟之间,曾子是不可缺少的承前启后者。颜渊早死,是曾子忠实地继承了孔子的学说和精神。且不说他对孔子的“吾道一以贯之”的理解超出各弟子(见《论语·里仁》第十五章),他的反求诸己的守约慎独的修养功夫(“吾日三省吾身”,《论语·学而》第四章)和“仁以为己任”、“任重而道远,死而后已”的气概(《论语·泰伯》第七章),也无人能比。

三、《大学》的原本与改本

《大学》有两种版本:一种是原本,另一种是改本。《大学》改本的出现,是从程颢、程颐开始,最后由朱熹完成的。二程对《大学》给予极高的评价,并进行了深入细致地研究。他们在研究过程中,感到原本有些地方行文不够通顺,便试着将原来的章节、文句做一些调换,从而使其义理通达、文气顺畅。于是,他们便断言《大学》原本有错简(古代书籍多写于竹简上,竹简是按前后顺序串联在一起的,但有时因为串联的绳索断开等原因,而使竹简次序发生错乱,从而导致文章的文句错乱,后人遂将这种现象叫做“错简”)。

怎样改动原本?由于个人对原文的理解或诠释不同,会有不同的改法。例如,程氏兄弟二人就有不同的改本。不过,改本虽不尽相同,但是在一个十分重要的方面却非常一致,那就是:他们所改动的绝大部分是原文中所引述的《诗经》、《尚书》语句的位置。古人文章中引述经籍的文

句,主要作用大致有两个:一是用来做自己说话的论据;一是用来借题发挥,以引出自己的看法。如属前者,则引文的出现,必紧跟在作者说法之后;如属后者,则引文之后,必紧接着作者自己的议论。看看《大学》的引文,程氏兄弟感到有许多段落都是前无所承,后无所继。但是,将这些引文的位置调整之后,这种现象立刻消失。做学问,写文章,需要条理清楚,结构严谨,所以程氏兄弟都写出了自己的改本,使《大学》成为文理通顺的文章。

朱熹继承了二程的主张,并加以推廓发扬。他不仅站在条理的立场,更进一步站在严格结构的立场,来改编《大学》并划分《大学》的篇章结构。他认为,《大学》是一篇结构严密的文章:开始的一大段,大致是全文的提纲,讲的是“大学之道”的纲领和条目;后面的各段,则是给这些纲领和条目所作的引证说明;因此,他断言:开始的一段是“经”(孔子的言论),后面各段是“传”。传就是对经的注释,而作为经的注释,传的先后次序自然要跟经文所述内容的先后次序相一致。朱熹正是按照这个原则来编成他的《大学》改本的,并据此将他的《大学》改本分成经 1 章、传 10 章共 11 个段落,1546 字。

经过改编分段之后,首段的经文和以后 10 段的传文的内容,大致上有一种对应的关系。唯一例外的就是传文的第五章。传文的第五章应该是说明经文中“格物”和“致知”这两个条目的,而今传文第五章对于这两个条目既无引证,也无说明。所以,朱熹认为这里一定有缺漏。有鉴于此,朱熹便根据程颐对“格物”和“致知”的理解,补上了一段传文,这就是所谓“格致补传”(或简称“补传”)。而朱熹的改本、经传和段落的划分,再加上“补传”,就合成了今本《大学章句》。

朱熹对《大学》和《中庸》并没有像对《论语》和《孟子》那样作“集注”,这大概和此前《大学》、《中庸》没有独立的定本、注释者少有关。朱熹给两书命名为《大学章句》、《中庸章句》,自己作了解说,并且在解说中贯串了自己的理学观点。

在朱熹的《大学》改本出现不久,就有些学者认为改本不如《礼记》原

本好。有一些学者是基于纯粹的学术兴味,总想找出古籍的原貌,不喜欢对古籍进行改动。还有一些学者是基于反对宋明理学,尤其是反对朱熹,其中最具有代表性的是王阳明的致良知说。王阳明认为,“古本大学”文义本来畅达圆足,实不必改动文词,编定章句。例如,朱子承程颐之说,把“在亲民”改为“在新民”,王阳明认为实不当改。

实际上,王阳明反对朱子的理学,提倡原本,是对《大学》的义理有自己的新的理解。他把“大学”理解为“大人之学”,他对“大人”的解释是:

大人者,以天地万物为一体者也。……大人之能以天地万物为一体也,非意之也,其心之仁本若是,其与天地万物为一也。岂惟大人,虽小人之心亦莫不然;彼顾自小之耳!……是其一体之仁也,虽小人之心亦必有之;是乃根于天命之性,而自然灵昭不昧者也。是故谓之明德。……故夫为大人之学者,亦惟去其私欲之蔽,以自明其明德,复其天地万物一体之本然而已耳……

至善者,明德亲民之极则也。天命之性,粹然至善,其昭灵不昧者,此其至善之发现,是乃明德之本体,而即所谓良知者也。(《大学问》,《王文成全书》卷二十六)

从以上的引文中,可知王阳明认为“至善”才是《大学》纲领中的纲领,而所谓“至善”实指“良知”。良知是人的本性,也是天地万物的根源。所谓“大人”,就是自觉此天赋之良知乃人之本性,同时是万物的根源,由此觉悟人与我、己与物之本为一体者。故此,所谓大学,只是除去私欲之蔽,让良知自明自显,由此见万物之本为一体,从而对于人人物物,皆能真实地亲之,以实现此一体之仁。于是,明明德和亲民实即至善的良知之呈现。

当然,历代都有反对朱熹的《大学》改本而主张学习原本的,如当今著名的儒学大师南怀瑾先生就反对朱熹的理学和《大学》改本而主张学习原本(见《大学微言》)。

的确,朱熹的理学偏离了孔孟的义理系统。他认为心具众理,但心与理是二不是一。他强调有理,但不能给理确立内在的根源。当代新儒学

大师牟宗三先生,在他的《心体与性体》中对此有精辟的论述。

总之,就一般读者来说,改本优于原本,这是南宋以来学者们公认的。所以,本书就是按朱熹的改本《大学章句》讲解的,但对其宣传理学之处,则尽量回避。

四、“大学”一词的含义及内容

“大学”一词有几种含义,在不同的上下文里和不同的语句里,可能表示不同的意思。朱子在《大学章句·序》中说:“大学之书,古之大学所以教人之法也。”在这句话里,“大学”一词共出现两次,两次所指并不一样。第一个是专有名词,指的是“四书”中的《大学》这本书。第二个“大学”是指古代的最高学府,培育经国济世人才的学官。这个“大学”的“大”应读为“太”(tài)。“大学”还有第三个意思,指“大人之学”。“大人”是指什么人呢?朱熹的意思是指在上位者,包括天子、诸侯;指有德业者,如圣人、君子;指长辈,如父母或年长者。朱子在《大学章句·序》中说:“及其十有五年,则自天子之元子(嫡长子)、众子,以至公卿大夫元士(天子之士,不同于公卿大夫之士)之适子(正妻之子,也专指嫡长子),与凡民之俊秀,皆入大学,而教之以穷理、正心、修己治人之道。”看来,这里所谓的“大学”,是指天子、诸侯等在上位者设于国都的学校;“大人之学”是指“穷理、正心、修己治人之道”,即成为圣人、君子的学问。

朱熹在说明“大人之学”时,常常与“小子之学”(或“童子之学”)相对照。对照不是在年龄、地位,而是在教学内容。小子之学的教学内容是:“洒扫应对进退之节,礼乐射御书数之文。”这些学问,在儿童进入社会之前,想立足于社会,是必不可少的。但通过学习这些学问,学者虽然掌握了,却只能知其然而不能知其所以然,以至于无法保证每一念头和操守都能恰如其理,所以还需要进一步学习“大人之学”。“大人之学”所教的正是“穷理、正心、修己治人之道”和这些道理的根源。

那么《大学》这本书里是否包罗了所有立身行事、修己治人的大道理及其根源呢?没有。如果是那样的话,《大学》这本书将是一部博大精深

的儒家典籍,超过了所有的经书。《大学》的内容,只是学者“入德之门”。牟宗三先生说:“至于《大学》,则开端别起,只列出一综括性的外部的(形式的)主客观实践之纲领,所谓只说出其当然而未说出其所以然。”(《心体与性体》二)至于实践这些纲领的具体功夫(如格物、致知、诚意、正心等),并没有详细解说。朱熹在《朱子语类》卷第十四中,对这点是这样解释的:“《大学》所载,只是个题目如此,要须自用功夫做将去。”所以,《大学》这本书的内容,只是写出了“大人之学”的规模,由此,初学者可学得进德修业的进程的次序,是“入德之门”。可见,《大学》实是儒学最初步的典籍。

五、怎样解读《大学》

《大学》里面讲三纲领、八条目,它是从主观的实践到客观的实践,把儒家实践的范围给你规定出来,但它本身的方向却不确定。它主要是列举了这些实践纲领,可是却没有对这些纲领做什么解释。比如《大学》说“明明德”,但是什么是“明德”呢?“止于至善”,什么叫“至善”呢?“至善”究竟是落在哪个地方呢?这在《大学》里面都不清楚。所以,在这些地方就有不同的态度,讲起来就有不同的讲法。牟宗三先生给我们做了深刻的分析,使我们在读《大学》时,能保持清醒的认识:

讲《大学》的人也就有不同的讲法,而最典型的两个态度就是王阳明的讲法和朱夫子的讲法这两者。朱夫子那个讲法是顺着《大学》讲《大学》,这是最自然的讲法,一般人也最容易走朱夫子这条路。朱夫子讲儒家是以《大学》为标准。朱夫子的讲法尽管很自然,比如致知格物、格物穷理,这很自然,但是他有一个毛病,他拿《大学》作标准,来决定《论语》、《孟子》、《中庸》、《易经》,结果通通不对。可是,如果你把《大学》讲成王阳明那种讲法,那也太别扭。你怎么知道《大学》里面“致知”的“知”就是良知呢?这也很麻烦。《大学》里面的致知、格物未必就是王阳明的那种讲法。王阳明是用他的良知教套在《大学》里面讲,他这种讲法在文字上是没有根据